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DOI:10.15986/j.1008-7192.2024.01.004

“第二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之路

——对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超越

杨磊鑫,叶荣国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如何对待本民族传统文化是任何一个民族实现现代化都不可回避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作用下进退两难。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第二个结合”文化发展新道路是对“保守—激进”文化困境的全方位超越,从二元对立到辩证统一,实现了文化思维的跃迁;从自卑自负向自信自强,实现了文化心态的重塑;从体用之争到实践指向,实现了文化焦点的转换。“第二个结合”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提供了方法遵循,拓展了理论空间,构建了话语方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激进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24)01-0026-07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作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13},即“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述,学界就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但大多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维度审视“第二个结合”。而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维度对“第二个结合”作了系统论述,突出强调了“第二个结合”的文化意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涵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底蕴和鲜明特色,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坚实思想基础的强大精神动力。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是“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内蕴着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深义和要求。近代以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保守—激进”的两极震荡中长期徘徊,直至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现代化”才有了新的思路——“以马化中”。虽然“第二个结合”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得以规范呈现,但是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开始了“化中国”的实践,开启了“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进程。可以

说,“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文化观,其破除了“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桎梏,是推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一、进退维谷:“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对峙

鸦片战争伊始,面对西方先进文明的猛烈冲击,中华传统文明的挫败无力昭然可见。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进而迈向现代化进程,无数仁人志士先后对西方的“器物”和“制度”进行了求索移植,但都以失败告终。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在屡次碰壁中逐渐认识到,“今兹之役,可谓为新旧思潮之大激战”^{[2]138},精神伦理和思想文化的觉醒才是中国的出路。于是,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并激烈演进,不同思想流派接续而起,并在“古今中西之辩”中形成了各自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立场。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各路有识之士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角色认知、功能定位和转化路向的探索中形成了“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观念。

收稿日期:2023-11-05

基金项目:全国高校思政课建设项目“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安徽师范大学)”(21SZJS34010370)

作者简介:杨磊鑫(1999-),男,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精神与中国文化;叶荣国(1974-),男,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E-mail:ylx05030@163.com

1. 文化保守主义

英国学者埃德蒙伯克在《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中批判法国大革命是想切断人类关系的实验,是同“传统”作最彻底决裂的暴力运动,保守主义由此发端,可见,维护“传统”是保守主义的本义。而文化保守主义是保守主义在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一般指对传统文化采取绝对肯定的文化观点,本质上是“文化惯性”“文化惰性”“文化懦弱”的一种体现。在中国语境下,文化保守主义主张将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发展中华民族的重要力量,在严守传统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以向下兼容的姿态对西方文化进行选择吸收和主观性诠释,实质上是反对变革传统,为了维护旧社会秩序而兴起的文化思潮。

毋庸置疑,文化保守主义在保存民族文化遗产,挖掘民族精神力量,筑牢中华民族根基等方面发挥了特有的作用,可以说文化保守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传统文化守护者的角色。但同时也限制了中国文化的发展空间,将中国文化束缚在“传统”的体系之内,实际上是文化领域的闭关锁国。另外,文化保守主义承扬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滑向了“文化决定论”的窠臼。比如在现代化的问题上,文化保守主义从不趋承于西方先发现代化的理念和模式,而是聚焦本民族文化,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现代化基因和力量,脱离社会存在,狭隘地将“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的决定要素,这是极为片面的^[3]。可见,文化保守主义固有的保守性使其难以指导近现代中国的现代化实践,难以真正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并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

2. 文化激进主义

文化激进主义是与文化保守主义相对的概念和观点,文化激进主义认为,在传统文化原有发展轨道上实现中华文化的新生是没有可能的,只有引入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改造,才是正确的中国文化发展路向。1933年,陈序经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中指明,中国文化的正确发展方向就是“要中国文化彻底地西化”^{[4]40},这同样是文化激进主义者的口号。如果说文化保守主义将传统文化视为民族发展的动力,那文化激进主义就把传统文化视为民族发展的最大阻碍,这其实

是基于唯心史观的文化观,将“古”和“今”割裂开来,认为“现代”的建构必然是“传统”的消弭,必然需要和“传统”划清界限。

文化激进主义克服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封闭”心态,主张学习西方文化,利用先进文化构建自身的文化体系,进而推动民族的发展,单从这一维度来讲是值得肯定的,可以说打开了文化视野,与世界文化接轨,突破了文化的民族主义,但是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全盘西化。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体系和文化现代化的根基和本源,文化激进主义者为了探求中国文化转化路径而“向外看”的同时忽视了“向内求”,没有看到传统文化本身的价值,是一种“忘本式开新”。毛泽东曾直指“全盘西化”的弊病就是“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5]707},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传统文化虚无倾向,而文化又是历史的结晶,“全盘西化”必然会吞噬民族历史,破坏民族根基,不可避免地走向历史虚无主义,更不必谈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二、允执厥中：“第二个结合”对“保守—激进”文化困境的超越

“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6]。不同于“保守—激进”的左支右绌,中国共产党执两用中、守正创新,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文化体系之中,为中国传统文化转型发展提供了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实现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结合、相互成就,一方面改进了原有文化结构,另一方面赓续了传统文化、精神和价值,为“传统”注入了“科学”基因。可以说,“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构建的平衡稳健的中国文化发展之路,其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史实践中逐渐走深走实,尽管受到一些挑战,比如有一些人借“两个彻底决裂”否定“以马化中”的正当性,片面地将“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误解为否定一切传统文化;还比如传统文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相当程度的阻滞,就断言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文化的“无用”和“过时”,但这些都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挽救了中国文化命运,推动中国文化极大发展的历史事实。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

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文化内涵、文化力量才得以构建、丰富和彰显。要而言之,“第二个结合”,也就是“以马化中”的文化机制、文化路向、文化立场是对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全方位超越。

1. 文化思维的跃迁:从二元对立到辩证统一

“保守—激进”文化困境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长期存在,是因为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本质上都摆脱不了二元对立、主客相分的文化思维方式,都是“形而上学”地看待中西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古今转变。这种文化思维方式从“自我”和“他者”的关系视角出发,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置于相互对立的绝境之中,夸大了矛盾的斗争性。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又对马克思主义发起了攻击,前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西学”,不能与中华文化相提并论,难以适应中国现实社会,后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代表西方文化,全盘西化不是全盘马克思主义化。

从问题视角考察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可以看出二者将“古今”“中西”两对不同维度的关系问题转视为“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问题,都包含着对“传统文化”如何向“现代文化”过渡的思考,或者说是“对传统文化”是否有“现代价值”的思考。但是造成“保守—激进”文化困境的二元对立文化思维将传统文化带入或好或坏的评价体系中,文化保守主义主张传统文化的“绝对价值”,尽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7]161},但这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的辩证反思,而不是空泛地谈传统文化的永恒适用性;文化激进主义则直接否定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可能,认为古是古,今是今,西方文化就是现代文化,移植西方文化是创造现代文化的不二法则。可见,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没有认识到“传统与现代”是伴随着对立的统一,是发展中的统一。

而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辩证法为基底构建并始终坚持的“第二个结合”文化观在思维方式上破除了“非此即彼”的禁锢,是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科学思维,体现在时空维度上对“古今中西”文化关系的历史弥合,对“传统和现代”的统一观照。马克

思曾指出,人们“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8]470-471}自己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立足唯物史观,将中国传统文化置于完整连续的中国历史链条中,既肯定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又将最具科学性和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与之相结合,为传统文化继续发挥自身价值,进而转向现代文化提供了枢纽。在这种文化思维的观照下,传统文化的局限性被“历史地”认识,传统文化的“糟粕”可以转化为“精华”,也就是说,“第二个结合”是真正在历史中,在发展中考察“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2. 文化心态的重塑:从自卑自负到自信自强

文化心态是人们在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中长期进行文化实践所形成的面对传统文化和建设新文化所自然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和价值选择,也是置身世界多元文化所展现出来的精神文化面貌,文化心态反过来主导着人们的文化实践^[9]。从文化心态维度考察“保守—激进”文化困境,可以发现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对立实际上是文化自负和文化自卑两极文化心态的对立,对应到文化指向上就是抑西扬中和抑中扬西的对立。文化是现实的反映,文化自卑和文化自负两种文化心态是对中国农耕文明和西方工业文明之间差距的应激反应,前者是极端的“进取心态”,后者是极端的“防御心态”。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观,“第二个结合”背后实际上是一种不卑不亢、不急不缓、自信自强的文化心态。结合是持续的结合、是深入的结合、是以相互契合为前提,以相互成就为目标的结合。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维度,还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现代化的维度来看“第二个结合”,“结合”本身都强调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是文化自信的表现。除此之外,确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和马克思主义相契合,也是文化自信的体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的彼此融通,互相成就,是对二者内在契合性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构建“第二个结合”之时就明确了“结合”的对象,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加以“基本原理”的限定,另一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以“优秀”的规定,对结合对象规范的同时包含了对彼此之间存在的高度契合

性的内在肯定。

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互为表里,文化自强是文化自信的高阶体现和结果指向,不谈文化自信的文化自信是肤浅的自信。从“结合”的结果来看,结合夯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文化基础,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构建了崭新的、强有力的文化体系,也就是说“第二个结合”的结果是文化自信的切实写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10]36}这个理由源自马克思主义给予的真理自信,更源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给予的文化自信。总之,“第二个结合”背后的文化自信自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心态,其深深嵌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之中,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11]350}。

3. 文化焦点的转换:从体用之争到实践指向

文化焦点是构建文化观念和进行文化建设所关注的文化重点。近代以来,“古今中西之辩”与“体用之争”相交融,相伴随,“体”和“用”的关系是不同文化思想流派都争相讨论的焦点。“体”和“用”是中国传统哲学范畴,“表现为实体和属性、存在的内在根据与外在显现、实体和功能、‘本’和‘末’等关系”^[12],到了中国近代,“体用”所涉及的问题延展至历史文化领域,而与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相匹配的“体用”认识就是“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尽管随着“古今中西之辩”的激烈演进,人们对于“体”和“用”的认识不断深化,但都摆脱不了“形而上”色彩,正如郭金平等^[13]指出,体用之辩的实质是文化独断主义,体用之辩中的“体”,实质是排斥其它文化平等地位的文化独断主义之体,体用之辩中的“用”,实质是作为从属成份的用。

如果说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体用之争”是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那“第二个结合”就是从实践出发构建的文化观念。也就是说,“第二个结合”实现了文化焦点的落地,把“改变世界”作为文化建设的方向。一方面,“第二个结合”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机制。“文明是实践的事情”^{[14]97},“第二个结合”不是单以“解释世界”为目

的,回答时代之问,而是要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创造一种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新文明。因此,在新的文化使命召唤下,“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5],更好地为推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培根铸魂立体”,是“第二个结合”的本质与职责所在。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第二个结合”的实践场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第二个结合”的实践目标指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6]22}。这里的“中国特色”不仅表现为基于社会发展状况的现实考量,更表现为历久弥新的文化底蕴与价值观念。具体来讲就是既借鉴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反思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病,又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是兼具科学性与民族性的现代化新路、好路。同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方位、深层次的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凭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磅礴力量实现民族崛起的壮丽征程。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所以附加“伟大”这一限定性前缀,是因为单纯的物质崛起并不是真正的复兴,中华精神文化的强盛繁荣既是复兴之内涵,也是复兴之伟力。聚焦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提出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6]21}的历史使命,可以看出,“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专有叙事体系,能够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属性和特色,筑牢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原生恒久的动力。

三、必由之路:以“第二个结合”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

何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从语义学的角度来讲,“传统”和“现代”是两个相对的概念,但不是绝对割裂的关系。文化领域同样如此,“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化”的根基,“现代文化”是“传统文化”的赓续,这不仅是在时间意义上对文化更易的朴素观照,更意味着传统文化能够适应新的文明形态,在历史与时代的呼唤中实现内在肌理的改

变。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既是“过程论”,既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挖掘、承扬、改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结果论”,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本质跃升,能够完美适配当下各种现代化实践。“第二个结合”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过程”的顺利推进,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结果”的成功造就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指导和必要的建设空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跨越的必然话语样态。

1. “第二个结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科学遵循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着丰富的哲理智慧,涵养着深厚的家国情怀,铸造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长流不息、熠熠生辉的完整历史链条,是过去社会淬炼的智慧结晶,也是当今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更是未来社会前进的价值向导。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理性审视,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17]25},以坚定的文化自信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精准、科学、宏大的角色定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凭借自身所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开放包容品格,革新进取基因,为人民安居乐业,文明长流不绝,民族强盛不衰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也为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世界话语权的获取奠定了软实力基础。

但是,小农经济、封建伦理、封闭地域等特定的时空背景决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历史局限性,难以完美适配当下各种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也就是说要想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必须有科学方法的介入,或者说是科学性引导和改造。“第二个结合”恰恰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15]。这是因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18]664}。“第二个结合”为我们挖掘、继承和改造“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遗产,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比如运用辩证否定的方法精准识别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对精华加以承扬,对糟粕加以改造;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创造符合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既贴切群众生活实际又

具备强大感召力和艺术性的文化成果;采用历史分析方法,对特定历史环境造就的历史文化人物和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创作的文化作品给予科学评价;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相结合,注重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两手建设。

总之,只有坚持“第二个结合”,才能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精髓,进而匡正其体系结构,延展其边界,拓展其形式,实现传统文化向“科学性文化”“现代性文化”的转化,为深入推进“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提供强大的文化力量。

2. “第二个结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空间需要

马克思曾言“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所需要的要素”^{[19]639}。任何一种文化实现现代化都需要空间,需要不断拓展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15]一般来说,文化现代化有“或内或外”两种途径:一种是内生型文化现代化道路,一种是外源型文化现代化道路。二者的区别体现在是否拓展新的文化空间,内生型文化现代化是在原有文化空间内,通过改造传统文化本身实现其现代化的转变;而外源型文化现代化是在原有文化空间的基础上,引入新的先进文化,拓展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空间,通过外来文化与原有文化相融、相嵌、相长,实现文化现代化。而从理论和实践的维度来讲,文化现代化的空间又分为理论空间和实践空间,“第二个结合”就是典型的外源型文化现代化道路,拓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理论空间。

中华民族孕育了具有相对先进性的东方文化,比如“阴阳相生”“和而不同”是“对立统一”的朴素表达,“万物一体”“因果相依”是“普遍联系”的原初体认,“变易哲学”“生生之道”是“运动发展”的传统释义,但是因为固有文化空间的限制,不仅导致这些早先闪烁人类智慧光辉的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转化为科学性、现代性文化,而且导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带有一定的

时空局限性。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提倡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政之所兴,在顺民心”等民本思想,不乏一定的王权主义色彩,“惟天地万物父母”的生态认识也可以看到神权主义的影子,“大同”社会理想有着明显的“乌托邦”意蕴,这些思想及其表达不能说绝对落后,但不能完全适应当今时代发展的需要。

而“第二个结合”通过寻找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打开并拓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空间。回望人类现代文明史,马克思主义不仅凭借完备的理论体系,科学的辩证思维,高尚的价值追求闪烁着永恒的智慧光芒,在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理性反思的基础上标定了“为人类求解放”的文明新指向;而且凭借对人类文化精华的广泛吸收和对现存的一切所进行的无情批判,使理论本身具备科学性和革命性,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现代的科学文化”,能够为任何一种文化的现代化提供广阔的文化发展空间。可见,“第二个结合”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找到了适宜的理论空间,只有坚持“第二个结合”,才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那些至今仍有现实价值的思想理论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并对其陈旧的表达方式和呈现形式加以现代性转化和时代性改造,进而在“真理与文化”双重伟力的持续迸发中推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

3. “第二个结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话语诉求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史中,体用之辩不仅是文化焦点,而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之初在对待“内弱外强”多样文化关系上难以避免的一种文化话语,但实践证明,随着文化现代化理念和道路的不断演进,这种话语方式却成了文化交流交锋、文化反思借鉴、文化融合生产等文化现代化必要环节的障碍。这是因为其内在的生成逻辑是将特定阶级主导、特定民族原有、特定时空孕育的文化唯心地视为人类文化的本性、共性,并将其作为排斥、支配其他文化的话语本体,其他文化只能作为其从属话语或被抛弃在话语之外。

没有文化话语的现代化就没有文化的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包含着文化话语现代化的指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同样面临着新话语的构建问题。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5]708-709}。党的十五大报告在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时进一步指出“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20]19},这一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科学表达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被再次强调。其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精髓论,即世界性、民族性和阶级性相统一的,也就是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文化精髓论,指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话语的构建方向^[13]。

“第二个结合”本身就是一种“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文化话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个性不言而喻,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人类共性”,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包含着“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双重意指,而且对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作出了肯定性的科学概括。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还确立了新的人类文化主体——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不同以往剥削阶级一样霸权式地将代表自身阶级利益的文化普世化,而是扬弃文化的阶级局限性,以追求文化的世界性为己任^[13]。可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有真实共性的文化,“第二个结合”能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力量的发挥和世界影响力的扩大提供话语形式和话语基础。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最具“结合”特性的话语表达,就是“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中国传统智慧与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两种世界理想话语的融合转化。可以说,“第二个结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话语现代化的必然环节和应然样态。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 [2] 陈独秀. 陈独秀文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3] 王宁. 从“第二个结合”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J]. 中华文化论坛, 2023, 12(1): 4-16, 184.
- [4] 陈序经. 中国文化的出路[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2卷[M]. 2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6] 习近平. 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国家治理

- 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N]. 人民日报, 2014-10-14(01).
- [7]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M]. 2版.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9] 范鹏, 李新潮. “两创”思想对“激进-保守”文化困境的四维超越[J]. 求是学刊, 2021, 48(1): 55-62.
- [1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 [11]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12] 杨国荣. 体用之辩与古今中西之争[J]. 哲学研究, 2014(2): 36-42, 127-128.
- [13] 郭金平, 顿占民. 文化现代化话语的转变: 体用之辩向共性个性统一的文化精髓论的飞跃[J]. 河北学刊, 1999, 19(1): 15-21.
- [1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5] 习近平.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 人民日报, 2023-06-03(01).
- [16]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17]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 [1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 3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选集: 第3卷[M]. 3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The Second Integration, the Path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Beyond cultural conservatism and cultural radicalism

YANG Lei-xin, YE Rong-guo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How to deal with one's own traditional culture is an unavoidable problem for any nation as they come to realize modernization. Before Marxism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was in a quandary under the domination of cultural conservatism and cultural radicalism. “The Second Integration”, a new path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that is opened up by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vercomes in all directions the “conservative-radical” cultural dilemma, hence realizing the transition of cultural thinking from the binary opposition to dialectical unity, reshaping the cultural mentality from inferiority and conceit mindset to self-confidence and self-reliance, and altering the cultural focus from the dispute of “Chinese learning for the foundation, Western learning for practical use” to the practical direction of cultural thought. “The Second Integration” provides a method to follow, expands the theoretical space and constructs the discourse mod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is the only way to modernize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Marxism;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cultural conservatism; cultural radicalism

【编辑 王思齐】